



历 代 文 选

唐 文

◎ 陈尚君 选注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前 言

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，唐代诗歌和散文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唐代诗人群星灿烂，唐诗成就震烁古今，唐诗名篇家弦户诵，唐诗风流沾溉百代，这些都已成为世人的共识，无需作更多的描述。唐人的文章虽未能如诗歌那样登峰造极，傲睨古今，但其成就和影响应该说都无愧于那一辉煌的时代。清人编《全唐文》一千卷，存作者 3035 人，作品 20024 篇^①，字数约相当于《全唐诗》的三倍。如果加上清末陆心源以来所作之补遗，今知存世唐文总约 35000 篇，作者当逾 5000 人^②，确可称洋洋大观。唐文上承汉魏，下启宋元，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，这一时期，也是可与战国、西汉、北宋并列的古代散文创作最为繁荣的四个时

期之一。从魏晋以来盛行近五百年的骈俪文风，在唐代得到充分的纠正，韩愈、柳宗元以他们的巨大创造力，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”^③，开创了一代新文风。唐文中有许多名篇广泛流传，称颂人口，也为世人所熟知。

韩愈、柳宗元倡导写作的文体，后世习惯称为古文，近人更将他们倡导古文的努力概称为古文运动。所谓古文，即先秦、西汉时期通行的单笔而不讲骈偶的散文，其对立面即为魏晋以来流行的复笔的骈文。西汉贾谊、晁错、司马迁、刘向等人的文章，或追求出语雄奇，或务求行文平实，均语旨简明而有抑扬顿挫之致，文皆单行，不杂骈俪之词。东汉班固、张衡、蔡邕等人所作，虽仍以单行为主，但多遣排偶词句，文章奇偶错杂，文体发生显著变化。魏晋时期，经曹植、陆机、潘岳的鼓吹和实践，恣意铺排、辞采华美、用典讲究的骈体文逐渐为多数文人所接受，形成文章的主流。到南北朝时期，更加踵事增华：对偶更趋严格整齐，用事用典更趋繁密精妙，辞采更趋华丽曼妙，字句更趋研练深微。随着永明声律说的推衍，四声平仄融入诗文，骈文更讲究骈四俪六，其形式追求达到了极致。这种追求形式华美的文风，适应了世家贵胄的文学趣尚，也产生了不少优美的篇章，但因讲究形式华美过于绝对化，文章所应承载的叙事、议论、抒情乃至应酬的基本功能，得不到充分的施展，大大局

限了文章的功用。南北朝后期，文体骈散的优劣之争，已有所展开。主骈文者倡文笔说，认为骈偶之作方可称文，单行者仅可称笔，不能称文；反骈文者如北周苏绰、隋代李谔，皆指责骈文竞为浮华，体尚轻薄，并希望借助朝廷的行政手段加以干预，但他们提不出新的适用的文体，苏绰倡导比骈文更不为世人理解的《尚书》谄诌文体，其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。

不容否认，骈文在唐代也保持着巨大的影响，在较长时期内占据文坛主导地位，并较六朝有所发展变化。唐初文体，多沿梁、陈旧习，变化还不太多。到四杰、燕许（张说、苏颋）出来，以博大闳肆的才情，将骈文写作推向了新的境界：体制对偶、平仄、用典更为纯熟精整，同时又追求内容充实，意境清新，遣词运典也更趋自然易懂。读到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、“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安在”等句，谁又能说骈文辞不达意呢？中唐陆贽的奏议，以骈文议政事，对偶、平仄均极其讲究，但语言通俗，很少用典，重气势而善变化，论事析理，无不理正情真，将骈文写出了新境界。在韩、柳力倡古文后，骈文仍然没有绝迹，唐末至宋初的近两百年间仍有相当的影响，只是毕竟已到强弩之末，罕有新意了。

唐初批评骈文的议论，最初见于史家的史论。他们在分析南朝、隋代败亡的教训时，不免想到华靡文风的无益于国家治理。魏徵、马周、朱敬则等人的议论文字，用骈文而尚切实，去浮华，即显示一种变化。

武后时陈子昂提倡文学复古，张扬汉魏风骨，反对“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”^④，确实起到了转变文学风气的作用。从陈子昂“始变雅正”^⑤到韩柳登上文学舞台的近一百年间，先后提倡文章复古、谴责骈俪文风的有萧颖士、李华、元结、独孤及、贾至、梁肃、柳冕等人，他们的议论虽各有差异，但有两点较为相似，一为强调文以道为本，以六经为准则，在儒学复古中追求文体变革；二是反对骈偶，倡导古朴直率的古文。这些作者的文学业绩虽尚未臻一流，也未能创作出足以胜过骈文的大批散文名篇，但在他们的倡导下，从开元天宝到大历、贞元间，社会通行的文体确已发生明显的变化。从对二十世纪出土的几千方唐墓志的分阶段分析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的痕迹：玄宗以前墓志大多为完全的骈文，玄宗后骈偶逐渐淡出浅切，贞元间全用骈文者已不多，单行直叙者已占多数。出土墓志未经后代选家别裁，最能看出社会上流行文体的状况。因此可以说，韩柳的主要任务已不是反骈倡散，而是要用文学实绩证明古体散文的优长。

韩愈、柳宗元的文体改革理论和实践，较他们以前的古文家有很大不同。他们也讲文章应该明道宗经，但又强调不仅是要宗法儒家经典，而且应与当时时事政治密切联系起来。他们也讲复古，但不像元结那样刻意批古，以致语言枯瘠，文理呆板，缺乏文采。对三代两汉的文章，他们取径较宽，对《庄子》的恣肆汪洋、《孟子》的博辩雄谈，纵横家的凌厉峻切，太史

公的深雄雅健，都能广取博采，融入创作中。对于骈体文的艺术技巧，也不作完全的排斥，而予适当的吸取。韩愈的下述议论，即表达了他对为文方法途径的理解：

将薪至于古之立言者，则无望其速成，无诱于势利。养其根而俟其实，加其膏而希其光，根之茂者其实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晔。仁义之人，其言藹如也。^⑥

气，水也；言，浮物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。气之与言犹是也，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。^⑦

或问：“为文宜何师？”必谨对曰：“宜师古圣贤人。”

曰：“古圣贤人所为书俱存，辞皆不同，宜何师？”必谨对曰：“师其意，不师其辞。”又问曰：“文宜易宜难？”必谨对曰：“无难易，唯其是耳。”^⑧

韩愈十分强调广泛师法古圣贤，师其意而不必刻意模仿文辞，辞必己出，不要刻意地故求难易，又强调作者学识道德修养积累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，“气盛”方可为文纵横自如。至于他们的文章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及对骈文技巧的吸取，今人已作了很精当的分析：

他们不仅继承了秦汉古典散文的优良传统，而且还创造性地吸取了骈文讲究对偶排比、声韵节奏的长处，使文章散骈相间、随势而异，声调优美，节奏铿锵，句式整饬匀美而又错综多变，贯注一种雄浑疏宕之气；而且都注意吸收前人与当代的语言，以熔铸新词。他们虽然反对骈文的词藻华丽，但他们的文学语言更加丰富多彩；他们虽然反对骈文的堆砌典故，但他们的文章更有事理的根据；他们虽然反对骈文的形式主义倾向，但却创造了比骈文更宜于表现内容的完美形式。^⑨

韩、柳两家文章风格的不同，容后文再谈。两人为文章似乎都刻意追求言必己出，戛戛独造，好奇尚古，不徇世俗。在赞赏他们巨大艺术创造力的同时，我们不能不感到些微的遗憾：他们的文章多独创而难师法，门人尚且仅能得其尚怪或尚易的一节，世人就更难效法了。彻底扭转文风的责任，只能留待北宋追法韩愈而为文务求平易自然的欧阳修来承担了。

唐文如何分期，前人意见颇有分歧。中唐时梁肃撰《补阙李君前集序》，认为唐文凡经三变：初变于陈子昂“以风雅革浮侈，再变于张说的“以宏茂广波澜”，三变于天宝后萧颖士、李华等人。梁肃撰此文时韩柳尚未成名，故不足通摄一代文风的总貌。宋初诸公力倡古文，认为韩愈以前皆不足称道，当然是一种

偏激的见解。宋祁作《新唐书·文艺传序》，沿用梁肃三变之说，但观照一代，所见稍为客观，区分亦略有不同。

唐有天下三百年，文章无虑三变。高祖、太宗大难始夷，沿江左余风，绵句绘章，揣合低卬，故王、杨为之伯。玄宗好经术，群臣稍厌雕琢，索理致，崇雅黜浮，气益雄浑，则燕、许擅其宗。是时，唐兴已百年，诸儒争自名家。大历、贞元间，美才辈出，擢跻道真，函泳圣涯，于是韩愈倡之，柳宗元、李翱、皇甫湜等和之，排逐百家，法度森严，抵轹晋、魏，上轶汉、周，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，此其极也。

以四杰、燕许、韩柳为三变，亦足成一说。明清学者议论颇多，在此不一一列举。参酌上述诸说及今人研究，我以为唐文大致可分四个阶段，以下分别试作介绍。

第一阶段从唐初到武后前期陈子昂提出文学复古主张，大约七十年左右（618—690）。大唐帝国建立之初，即十分重视文化建设。唐太宗即位之前，就设文馆广招文士，即位后更留心艺文，重用秉笔之士。齐梁以来的骈偶绮丽文风，虽仍保留着巨大的影响，但也开始显示变化的迹象。贞观年间广开言路，太宗虚心纳谏，鼓励直谏，一大批在朝直臣和寒素布衣直言议政，写下了不少直言极谏的优秀文章。这类文士有

孙伏伽、马胄、虞世南、姚思廉等，而以魏徵最为世称颂。存于《贞观政要》和两《唐书》中的魏徵谏文，虽仍循骈文规范，但淳朴直切，议论纵横，感情真挚，说理透辟，与六朝文风的浮艳迂远有很大不同。唐初史家如李百药、令狐德棻、姚思廉、李延寿等人之著作中，也可看到这一变化。在昭陵所存唐初名臣的数十通碑文中，文体虽仍是严格规范的骈体文，但其气象格局，已较前此文章更为恢廓开展。在野文士的文章，当以王绩最有可观。他的诗文都充满怀才不遇的牢骚，表达狂放愤世的情绪，行文也骈散杂用，自成气象，可说是陶渊明以后最具个性的退隐文士。

唐初百年间，《文选》学盛行，注释、研读蔚为风气，同时，类书编纂也为举世所重视。类书从唐初一百六十卷的《北堂书钞》、一百卷的《艺文类聚》，到武后时期发展到上千卷的《三教珠英》。这些工作适应了骈文写作检索备用的需要，也造就了一大批鸿才博识的文章大家。并称“初唐四杰”的王勃、杨炯、骆宾王、卢照邻，并称“文章四友”的崔融、李峤、苏味道、杜审言，世称“燕许大手笔”的张说、苏颋，就是这样的一批作者。四杰是一群怀才不遇的作者，他们有政治抱负，但得不到机会，诗文中充满牢骚愤世之情。他们文章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情感已超越了六朝骈文的樊篱，但文章形式并没有多大变化，以他们的博达雄才，将骈文的种种羁绊变为展示才华的手段，纵横自如驾驭辞章典故，将骈文写作推向了一个新境

界。稍后于他们的四友、燕许等人，文学创作大致与陈子昂同时或稍后，在仕途上大多较为显达，写得较多的是制诰、表奏、碑版等类应酬文字，文章内容自略逊于四杰，但所作不乏格局宏大、用思深沉的作品，是与进入盛唐文化的社会气象相适应的。相传崔融为作《则天皇后哀册文》，文辞高丽而命意得体，终致思苦神竭而亡，可见这群作者为文的认真不苟。

第二阶段从陈子昂倡说复古，到韩柳登第成名，大约一百年左右（691—792），是唐文由骈趋散，逐渐变化的时期。陈子昂那篇著名的文学复古宣言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》，主要是针对诗歌的“逶迤颓靡”、“采丽竞繁”而言的。他认为汉魏以来的文学传统丢失已久，要重新振作必须先向古人学习。他特别提到了建安、正始两个时代的作者，提到了那时诗歌中最突出的特点，一是“风骨”，二是“兴寄”，即以作品的充实内容和情感张力以廓清颓风。他的议论中虽然没有涉及文体变革的内容，而且他本人所作的文章仍大多为骈文，但他却指出了文学发展以复古求变革的正确方向，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。他的文章以政论为多，大多纵横驰骋，直指时弊，言辞激切而又说理充分，比魏徵的从容进谏又有所不同。韩愈《荐士诗》说“国朝盛文章，子昂始高蹈”，很有识见。

陈子昂同辈或稍后的文章家，如文章四友、燕许等人，以骈文为主而已有所变化，已见前述。开天盛世的散文家，也可举出李白、王维的抒情记序，李邕、

颜真卿的碑版文字，刘知几、张九龄的议论文章，虽也有各自的成就，但与盛唐诗的辉煌比较，自要逊色许多。这期间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二，一是文章复古潮流的兴起，二是骈文的质变与逊退。前者以萧颖士、李华、元结、贾至、独孤及、梁肃、柳冕等为代表，倡导文章复古，主张文学应以六经为旨归，文章应有一定的社会内容。他们也曾努力于散文写作，并期冀有所作为，但因才力不足，讲复古而未充分吸取骈文在声韵辞采方面的长处，所作虽也各有成绩，但终未臻一流。其中萧颖士为人刚烈而有志节，所作多自述抱负和愤懑，好恶分明，狂率不逊，为时所称；李华与萧颖士齐名，对“世教沦替”每多感愤，^⑩倡导以质文挽回颓风，书札颇具真情，但最为世称的还是那篇骈偶遗习较浓的《吊古战场文》；元结提倡复古最坚定，诗风中均坚决扫落文采，务求质朴，但所作不免质木无文，缺乏感染力，有名的《右溪记》也显得十分局促；贾至尊崇儒学，反对浮艳，甚至认为汉代文章已不足观，但他最有名的还是那些高华典雅的制诰册文，可观者不多；独孤及早年即被推许为词宗，所涉及面较宽，尤以议论见长，送序、吊祭、铭赞、游记也有可称之作，且门人众多，一时颇有影响；李翰所作，梁肃评为“文章之雄”，认为其“道能兼气，气能兼辞”^⑪，十分推重，只是他最负盛名的《张中丞传》未能留存于世；梁肃在大历、贞元间文名颇盛，韩愈早年亦曾向其问学，但他对天台佛学沉迷极深，

虽也讲文章应为“儒林之纲纪”^⑫，《梁高士碣》等文也颇具特色，终不如他鼓吹佛教诸文的精密独诣；柳冕存世文章近半数为论文之作，议论也颇为激烈，但所作不及所论，正如他所坦白承认的“意虽复古而不逮古”^⑬。在这一大批文章家的反复鼓吹和努力倡导下，天宝至贞元间的文风已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在叙事、议论、抒情类文章中，骈文已不再占主导地位，散行的文章已为许多作者所乐于采用。唐初墓志几乎一概用骈文，除叙志主家世、历官、生卒外，其余全为骈四俚六的颂句；大历、贞元间墓志已很少这种情况，大都为质实的叙述，正可看到这一变化。骈偶文章也日趋朴实流畅，陆贽文章的成就可以认为超过了与他同时的几位古文家。建中、贞元间朝野多难，陆贽从翰林学士做到宰相，对朝政得失建言极多，一时王言也多出其手。据说他所作文章“虽武夫悍卒，无不挥涕感激”^⑭，苏轼对其推崇备至，《四库提要》以为“足为万世龟鉴”。

第三阶段为韩柳的文学创作时期，也是唐代散文发展的鼎盛时期，从韩愈登第到他去世，仅三十二年（792—824）。韩愈和柳宗元两人仅相差五岁，因父、兄的缘故，可能少年时即已相识^⑮，尽管中年时因彼此政治立场的不同而稍有齟齬，又因柳宗元的南贬，在各自文学活动的极盛时期分居南北，来往颇疏，但从柳去世后韩多次撰文祭悼纪念来看，两人的友谊可说是贯穿一生，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可视为佳话的。

两人都倡导古文写作和儒学复兴，又都具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充沛才情和坚定意志，以毕生的努力共同开创了中唐散文的辉煌。从杜牧提出韩柳齐名后，历代学者很少异议。从大端来说，两人追求的文学目标是十分接近的，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说，写作旨趣和行文风格等方面来说，又有很大不同。他们都曾多次论述文、道之间的密切联系，主张文学改革应与儒学复兴紧密结合，从学派上说他们都是主张以意解经、鼓吹《春秋》尊王之说的啖助、赵匡一派的后学，都曾问学于名儒陆淳，但对儒家之道的理解和申述，则颇有所不同。韩愈的《原道》无疑是他儒学复古的纲领性宣言，揭出仁义道德为儒家之教的根本，试图确立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以来的儒家道统，从经典、制度、社会分工、等级秩序到衣食住行各方面按儒家理想重新建立伦理道德秩序，并据之以排攘佛老，申明夷夏之分。尽管宋儒大多认为他对儒家之道认识尚不纯正，但在学术史上无疑是宋儒学说的始发端者。柳宗元则更多地阐说“以生人为主”^⑮、“辅时及物”^⑯、“利于人，备于事”^⑰的大中之道，崇儒的同时也虔诚信佛，甚至认为“浮图诚有不可斥者，往往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合”^⑱。就为文风格来说，两人都重视向先秦两汉文章学习，都积极倡导古文写作，都重视文章应内容充实，感情充沛，有气势和文采。韩文雄奇多变，“如长江大河，浑浩流转”^⑲。韩愈师古

而不泥古，更重“词必己出”^②、“唯陈言之务去”，在文章的结构布局、曲折变化和语汇创新方面，均十分刻意用力。其文章有时警句突起，如危峰壁立，不同凡响；有时又从容叙来，如远山入画，气韵悠长。他特别注意发挥散文句式长短错落、变化自如的特点，以句式的错综变化增进文章的节奏感，以语意的再三转折造成文章的跌宕起伏之势。他是熔铸新词的天才，汉字经他妙手搓揉拼装，产生无数富有生命力的语汇，仅《进学解》一篇就为后人提供了三十多则流行的成语。尽管因着意求新也做了许多冷僻生涩的文字，但他对汉语辞汇的贡献可说是空前的。柳文幽丽峻洁，注意情感表达的深沉隽永，较明显地受到两汉文章的影响。他因政治上受挫，长期贬居南方，郁悒之感常流露于各体文章中。就散文的总体成就和影响来说，柳稍逊于韩，但在山水游记、托意寓言、人物传记、骚体文和政论文诸方面，柳文皆有出色的建树，又为韩所不及。韩柳散文代表了唐代散文的最高成就，并直接影响北宋欧、苏、曾、王诸人，彻底扭转了六朝以来重骈轻散的文章风气，为其后千年文章家所宗仰师法。

第四阶段从韩愈去世到唐末，或按以五代为闰唐的惯例延至五代入宋，大约一百三十五年（825—960），是唐代散文的衰落时期。韩柳二人皆好为人师，一生以劝诱后学为己责，即便贬谪时期亦未轻弃。经他们的努力而形成风气，一时称盛，但后学的成就，

似乎逊色太多，以致他们身后颇显寥落。后世习惯以李翱、皇甫湜为韩门传人，其实李翱为友人而非门人。他文风平易，《复性书》对宋代性理之学颇有影响，以至宋人或以韩李并称，但其文学造诣毕竟有限。皇甫湜走韩文奇崛一路，门人有来无择，再传孙樵，终唐之世尚存韩门一脉，但诸人都缺大家气象，文风也渐涉险怪，有佳作而总体成就不高。倒是与韩、柳同时的白居易、刘禹锡，稍后的舒元舆、刘蕡、杜牧，古文尚足以名家，各成面貌，其中白居易、舒元舆的记序，刘禹锡的寓言，杜牧的政论，刘蕡的对策，皆为一时所称颂。

会昌、大中以后，党争激烈，政事日紊，并最终导致庞勋、黄巢揭竿，群雄混战。这一时期的文章变化，有两个突出的倾向。一是骈文的复起。李商隐、温庭筠、段成式所作骈文号“三十六体”（因三人皆排行十六而得名），香艳绮丽，精致圆熟，可视为回归齐梁的新体骈文。这种骈文在应试举子和秉笔文士中得到广泛响应，唐末文坛上可以看到律赋的盛行，表状启札类应酬骈文的普及，以及和香奁花间类诗词相适应的香艳文章的流通，并最终演变为宋初的时文和崑体。这一时期骈文也有许多变化，如在崔致远的骈文中即可看到句式的延长和偶句的错综多变，可说是骈文取资古文的发展。二是讽世小品文的繁荣，罗隐、皮日休、陆龟蒙为代表作者。三人均曾久涉科场，长期沉沦下僚，对当时的政治腐败和民间怨怼了解至深，

以他们的身份还不足以建白朝论，纵论国是，因托杂文以讽世，以嘻笑怒骂的笔调讥刺权贵，渲泄郁愤，为唐代散文留下了最后的余辉。

本书是唐代散文的中级选本，以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为主要阅读对象，在选目中即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，所选既照顾到唐代各时期的代表作者，又尽可能选录历代传诵、为世公认的名篇，骈散兼取而以散行的古文为主。有些重要作者因无合适可选的作品只能割舍，有些极负盛名的作品或因篇幅过长，或因文意较深，也只能暂不选入。入选各文均录自通行的可靠善本，并取有关典籍和版本作了一定程度的校改，限于体例不能一一说明。注释采用简明今注，遇文意艰深处作了适当的解说，有语典、事典者适当征及原典出处，凡此皆希望对读者欣赏、阅读入选唐文有所助益。编选、注释工作可能还存在许多错误不当处，敬请读者匡正赐告。

陈尚君

2000年2月3日于复旦

【注释】

①此据日本平冈武夫《唐代的散文作品》所作统计。

②清末陆心源辑《唐文拾遗》、《唐文续拾》二书，补文2872篇，新见作者476人；周绍良辑《唐代墓志汇编》存文3676篇，新见文约3000篇；吴刚主编《全唐文补遗》已出六册，存文近5000篇，新见约

1500 篇；拙辑《全唐文补编》存文 6200 篇，新见约 5900 篇；上述诸书未收的见诸石刻、敦煌遗书中的存世唐文尚有约 2000 篇。此处即据此估计。

③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。

④陈子昂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》。

⑤《新唐书·陈子昂传》。

⑥⑦⑧韩愈《答李翊书》。

⑧韩愈《答刘正夫书》。

⑨高文、何法周《唐文选·前言》。

⑩李华《与外孙崔氏二孩书》。

⑪梁肃《补阙李君前集序》。

⑫崔恭《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》。

⑬柳冕《与孙给事论文书》。

⑭《旧唐书·陆贽传》。

⑮现在韩、柳交往最早的文字为贞元九年的慈恩寺塔题名，但韩愈青少年时期是居于宣城，柳宗元父亲柳镇其间曾任宣城令，柳撰《先友记》以韩会、韩愈兄弟为父友，因知二人相识可能始于宣城。

⑯柳宗元《陆文通墓表》。

⑰柳宗元《答吴武陵论〈非国语〉书》。

⑱柳宗元《时令论》。

⑲柳宗元《送僧浩初序》。

⑳苏洵《上欧阳内翰书》。

㉑韩愈《南阳樊绍述墓志铭》。